

五重间谍：真实的“伪装者”袁殊

“伪装身份,隐藏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在电视剧外,一位真实存在且比明楼更传奇的“伪装者”浮出历史水面。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叫袁殊。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命运坎坷。新中国成立后,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直到1982年才平反;子女曾对他的政治面目疑虑重重。

父亲是个“谜”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曾龙见到了阔别22年的父亲袁殊。在他记忆里,父亲名叫曾达斋。直到1955年上半年的一天,他被家人告知:父亲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尚未定性。此后多年,他都不知父亲关押何处,定了什么罪,判了多少年刑。1961年,曾龙面临考大学,写信询问已与父亲离婚的母亲怎么填表。从回信中曾龙第一次了解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军统,做过区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年岁渐长,曾龙从奶奶口中了解了袁殊更多身世。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生于湖北蕲春没落的书香门第,因家境困窘,幼年随母到上海投亲,12岁进印刷厂做学徒,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读书;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军,“四·一二”政变后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几经周折后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曾龙无法理解,袁殊怎样完成“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的身份切换?

消失20多年的父亲1977年突然回京探亲。1955年袁殊被捕,拘留审查10年,1965年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值“文革”,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又被解送到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此后几年,袁殊才开始与子女通信,回京探亲。1982年8月29日,最高法院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袁殊无罪。

《文艺新闻》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眼中,袁殊是打满了问号的历史人物。

上世纪50年代中叶,复旦大学学子丁淦林读到袁殊写的《记者道》,知道袁殊曾“转行”做情报工作,但不明白他为何成了“汉奸”。1984年5月14日,丁淦林偶然看到《解放日报》才知袁殊尚健在,托人对他进行了访谈。袁殊谈得最多的是1931年创办的周刊小报《文艺新闻》。他说,当年想创办一张以新闻为中心的报纸,当职业记者。妻子马景星筹集了500块钱经费,袁殊当总编辑,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发行,租了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编辑部……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出版发行,为“左联”做了大量宣传工作。矛盾称它为“‘左联’领导的一个外围刊物”。

最为称道的,莫过于袁殊策划的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系列报道。“左联五作家”及其他18名革命志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消息被封锁,长达几个月人们都不知道情

况。“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找到袁殊:“各报刊杂志均不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袁殊应允。不过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他和《文艺新闻》、冯雪峰都将面临风险。袁殊请冯雪峰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化名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作家蒙难的消息。第三期头版,一封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来信见报;第五期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第六期登载五位作家的遗照,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分别发表回忆文章。文章激起群众对当局的痛恨,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

《文艺新闻》出版了60期,成为“左联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刊物”,袁殊因此进入左翼文化界圈子,1931年6月,在潘梓年介绍下加入“中国文化总同盟”,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袁殊首次提出“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常应邀去大学演讲,1932年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一书;其新闻学著作包括《记者道》等;剧作《工厂夜景》被郁达夫称为可与高尔基的《夜店》媲美。如果不是一次谈话,袁殊的名字或许将留在中国文学或新闻学的历史中。

“灰色小市民”

谈话发生在1931年10月的一天,按潘梓年的通知,袁殊到达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角落的桌旁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潘梓年的堂弟潘汉年,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另一人袁殊从未见过。潘汉年对袁殊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考察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简单的一句话,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不知道你的身份。”“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央特科。当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新的中央特科重建,潘汉年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急需重建情报网络。夏衍口中“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就进入了他的视野。潘汉年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就是在座的那个人。

袁殊被要求褪掉“红色”,变成“灰色小市民”,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借着流氓小报和御用文人攻击的“东风”,《文艺新闻》于1932年6月20日停刊。袁殊改名“袁逍逸”,褪去“红色”,在王子春的安排下接受了两个月秘密训练。

1932年春,王子春指示他给在上海的表兄贾伯涛写信谋职,贾把他介绍给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由此打入中统,后来成为中统的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王子春指示袁殊向吴醒亚讨个记者的职位开展活动。袁殊再次回到新闻界,供职的是政治色彩不强烈的新声通讯社,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获取消息。

不久他在王子春策划下,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装作随意翻阅日文杂志引起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的注意,一来二去成了朋友。半年后,

岩井英一请袁殊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袁殊在王子春指导下报告给吴醒亚,吴醒亚鼓励他与岩井英一交往。至此,袁殊成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隐藏最深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王子春指导下,三重身份的袁殊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眼皮底下“伪装”了3年。1935年,上海出了奇案——“怪西人案”,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被称为“怪西人”,审讯人员在其带的小本上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原来1935年春王子春突然不露面,袁殊急于与组织联系,便请夏衍转封信给特科领导。信被转给蔡叔厚,当时蔡转到远东情报局工作,且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于是袁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关系被转到远东情报局。“怪西人案”案发是因陆海防叛变,陆是华尔顿的下线,也是袁殊只见其信未见其人的上线,袁殊因此被捕。不料1937年下半年,袁殊又以“军统潜伏人员”身份在上海滩活跃起来。

爆破“76号”

由于日本领事馆将袁殊视为“亲日”派,军统也有意拉拢袁殊,再加上父亲袁晓岚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袁殊只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两年半监禁,实际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1936年,袁殊再次赴日本留学,回国时已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沪,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情报工作更困难,戴笠登门要委以重任。经向潘汉年汇报请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公开身份是记者,继续与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电视剧《伪装者》中的明楼爆破了汪伪政府运送日军高官的专列“樱花号”。真实历史中,袁殊至少策划了两起爆破事件,一件是爆破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仓库设在日商“本田纱厂”后院,袁殊和王铁民化装侦察发现,凭特别通行证出入的几乎都是日本人,仅有一个伙夫是中国人,每天踏“黄鱼车”买菜送菜。袁殊让王铁民跟伙夫套近乎,趁机将定时炸弹藏进“黄鱼车”上整只的南瓜和冬瓜内……袁殊因策划虹口大火被军统局记大功。

“爆破76号”的计划并不顺利。1938年,汪伪委任丁默邨、李士群在极斯菲尔路76号筹建特工总部,镇压抗日运动。袁殊接到军统命令干掉李士群,他决定挖地道将76号“一锅端”,计划得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谁知尚未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被捕,供出计划。袁殊随即被捕。

袁殊借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将消息传递给岩井英一,潘汉年也请袁妻马景星给岩井英一打电话求援。一个月后,已是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出面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原来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务省与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有矛盾,岩井英一想在新的政治和文化层面利用袁殊。

“严军光”

袁殊脱险后住在岩井英一安排的百老汇大厦,身边有其两个部下明为“保

护”实则监控。不久,岩井英一要求袁殊写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就是要袁殊变成公开的“落水汉奸”。在潘汉年授意下,他将计就计,以军统人员身份写成《兴亚建国论》一文,概括了和岩井英一“商谈”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1939年11月在报刊发表,署名“严军光”,但李士群把“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张扬开来,大家都知道袁殊“落水”了。袁殊曾解释“严军光”的含义:“‘严’与‘年’谐音……表示我受潘汉年委托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袁殊给戴笠写信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将打入敌人内部为抗日做贡献。戴笠回信慰勉袁殊。此后,袁殊和重庆一直保持联系。袁殊又重建同中共、军统以及日本人的多方关系。幕后是潘汉年和袁殊串的“一回戏”,一直演到抗战胜利。

岩井英一扶持袁殊组建“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掣肘汪精卫,让其负责日本特工机关“岩井公馆”。后来,袁殊还曾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他和潘汉年将地下党员陈孚木、恽逸群、翁从六等安插进“岩井公馆”,获得多个重大军事战略情报。潘汉年甚至在“岩井公馆”设立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担任“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期间,袁殊向党组织提供了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宝根研究袁殊,翻阅了日文版的岩井英一回忆录。据岩井英一回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是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中共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部分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操作下,重要战略情报也发送到延安。

新的黎明

抗战胜利,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中将军衔,戴笠决定10月10日见袁殊。袁殊却在见面的三天前投奔解放区。1946年初,军统对其下了通缉令。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建议他改名字。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解放战争中一直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袁殊在李克农手下工作。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蒙冤被捕,5日袁殊被捕,直到平反还有不了解内情的人认为他是“汉奸”。“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这是袁殊1971年在秦城监狱写下的诗句。

1982年8月29日,最高法院对袁殊案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复查结论:确认其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党籍。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原名。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1987年11月,袁殊在京病故。来源:北京日报